IMFBlog
INSIGHTS AND ANALYSIS ON ECONOMICS & FINANCE

你该为退休储蓄多少？

作者：David Amaglobeli、Era Dabla-Norris和Vitor Gaspar

东京的行人，日本：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数量更多，公共和私人储蓄可能更低。（图片：Kim Kyung Hoon/路透/Newscom）

2019年1月15日

你需要为退休储蓄多少取决于所在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我们的新研究关注老龄化世界中储蓄和养老金制度的相互作用。我们根据老龄化人口和养老金制度设计，使用来自80个国家的数据来分析未来30年各国的公共（政府）和私人储蓄。

我们发现，私人储蓄的趋势推动了国民储蓄的变化。假设政策保持不变，到2050年，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公共养老金支出上涨占GDP的比例略高于2个百分点。但各国家庭私人储蓄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因为养老金制度的特征是决定家庭储蓄多少的一个主要因素。政策

制定者需要了解储蓄率变化的驱动因素，因为储蓄为经济衰退提供了一种保险，并通过支持投资活动，刺激经济的长期增长。

足够年长则不惑，足够年轻则选择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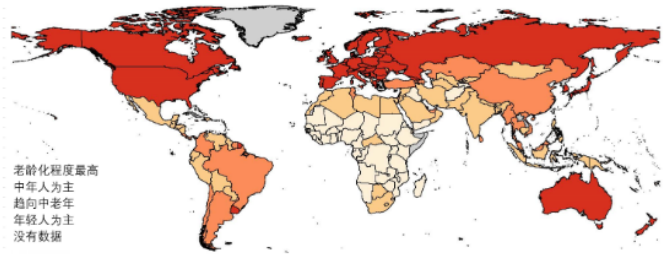
无论你是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千禧一代，还是40岁左右的教师、汽车组装工或个体户，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都会退休。

退休后，也许你能享受优厚的公共养老金；或者你所处地区的公共养老金十分微薄。你的退休金可能取决于过去的工资，也可能采用专用养老金储蓄账户的形式，如美国的401（K）。在计划退休时，你还将关注银行账户中的其他储蓄，可能还有投资组合。

总体来看，储蓄行为会随着年龄发生变化：年轻人借钱，壮年劳动者存钱，而老年人退休后消耗他们的积蓄。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更多，总储蓄规模可能更低。与此同时，人类寿命的延长意味着人们需要在工作阶段为退休后积累更多储蓄。

当我变老时

各国老年人口比例差异很大，这对储蓄率有影响。老年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其储蓄率往往低于年轻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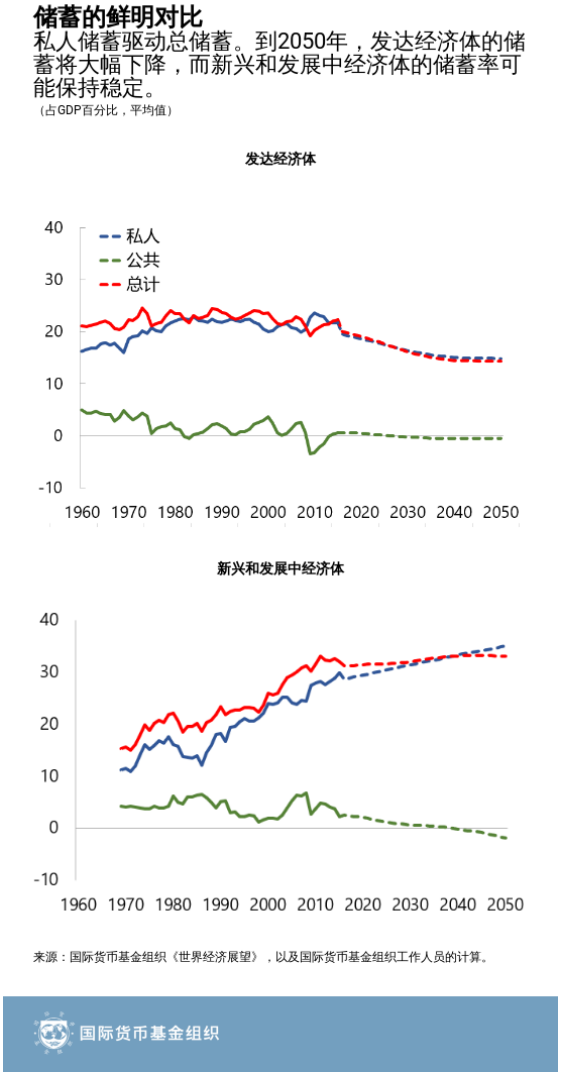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2016年世界人口前景》，以及国际货币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国家分类是基于k-means聚类算法，考虑到各国人口转型当前状态（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5b，附件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你的储蓄行为非常重要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私人储蓄的发展如何影响国民储蓄。就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由于其人口平均年龄相对较低，其私人储蓄规模较大。相反，我们预计老龄化的发达经济体私人储蓄率将急剧下降。研究还证实，在政府尚未实施养老金福利改革的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养老金公共支出将会增加。



这些总体情况掩盖了各国养老金制度设计不同导致的巨大差异。最重要的特征是公共养老金的慷慨程度，以及是否设有专用养老金储蓄账户。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慷慨的公共养老金会导致公共储蓄减少，因为养老金支出规模较大；这也会导致私人储蓄萎缩，因为慷慨的公共养老金减轻了退休群体对个人储蓄的依赖，降低了其储蓄意愿。相反，低公共养老金可以推升私人储蓄，因为这促使人们为主要依靠自给自足的退休生活增加储蓄。

例如，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作为老龄化国家，都提供专用养老金储蓄账户。但澳大利亚的养老金相对国民收入而言不那么慷慨。因此，预计澳大利亚的储蓄增长速度比俄罗斯快得多。

设立专用养老金储蓄账户更易于为退休进行储蓄，例如美国的个人退休账户（IRA），这有助于增加私人储蓄。拥有此类账户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预计私人储蓄将会增加。

政策制定者能做些什么？

在公共养老金较为慷慨的国家，限制提前退休或调整养老金福利的规模将有助于解决（未来的）资金短缺问题。

在发达经济体，这种改革降低了养老金的慷慨程度。为确保退休后维持生活水平，当前劳动者不得不延长工作年限，同时增加储蓄。

我们的模拟表明，有两种方法可以确保人们退休后维持类似当前的生活标准。一是到2050年，将平均退休年龄从现在的63岁逐步提高到68岁；那时，人类的寿命预计也将延长约3年。二是每年增加占收入6%的储蓄。

政府帮助公民的方法包括，促进金融部门工具发展以鼓励劳动者自发储蓄，采取措施鼓励劳动者延长工作年限。在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政府还可进一步促进正式部门的工作。

然而在一些国家，如中国和韩国，私人储蓄水平已经非常高，而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提高养老金制度的慷慨程度。这将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需求，缓解不平等和老年贫困现象。

这些政策组合可以抑制公共储蓄的潜在下降，同时提高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确保人们退休后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平。

相关链接：

本周图表：亚洲老龄化的代价

日本老龄化给金融体系带来压力

*****

David Amaglobel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主任助理。此前，他负责严重监督案例以及危机国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项目的设计和评估，包括近期乌克兰的案例。2009年11月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他曾在格鲁吉亚本国担任多个职位，尤其是格鲁吉亚国民银行代理行长和财政部副部长。担任上述职位期间，他与巴黎债权人俱乐部就债务重组协议进行了谈判，并引入了通胀目标制。

Era Dabla-Norr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处长。目前负责与结构性改革与生产率问题、收入不平等、财政风险和溢出效应、人口统计和财政动态等有关问题。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来，曾就多个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开展工作，曾发表多篇文章，广泛涵盖多个主题。

Vitor Gaspar，葡萄牙人，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主任。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他曾在葡萄牙中央银行担任多个高级政策职务，包括最近担任的特别顾问。2011-2013年，他曾任葡萄牙财政部长；2007-2010年，任欧盟委员会欧洲政策顾问局局长；1998-2004年，任欧洲中央银行研究部主任。Gaspar先生拥有里斯本新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做博士后。他曾就读于葡萄牙天主教大学。